



毛 琦 著

昆虫学家传奇

A LEGENDO DE ENTOMOLOGO

天 则 出 版 社

昆虫学家传奇

LA LEGENDO DE ENTOMOLOGO

毛 铤 著

天 则 出 版 社

昆虫学家传奇

毛 琦 著

*

天则出版社出版

天则出版社电脑室排版

(陕西 杨陵)

陕西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25 印张 60 千字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559-225-1 / I · 6

定价: 2.50 元



周尧教授近影

编者的话

本书选收报告文学一篇，叙事诗一部。不论是诗和文都反映了作者游刃有余的天趣与学力。行文纵意驰情，笔墨恣肆汪洋，保持着他在创作上具有辐射性思维的一贯特色。

《昆虫学家传奇》是一篇礼赞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的纪实性作品，既有大笔勾勒，又有工笔描绘，读来引人入胜。其中写到这位科学家坎坷困顿的段落，让人扼腕同情；而当写到这位科学家百折不挠，并在科研上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时，又让人为之舒心展志，扬眉吐气。它是一部多采多姿的科学家长传略，也是一篇十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吆雁记》是一部歌传体的叙事诗，虽说是纯粹的文学创作，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主人公陈大千教授催人泪下的遭遇，也是动乱年月许多科学家共同的遭遇。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读了这部叙事诗，会使我们加倍地珍惜今天的团结安定局面。“语必关风方传远”。作者采用民族传统的歌传体写法，显然增加了它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周尧教授与作者合影

目 录

· 报告文学 ·

昆虫学家传奇

——记周尧教授

作者按语

〔附录〕 刘兰：我所知道的周尧教授

· 叙事诗 ·

吮雁记

陈双奴歌传

· 特 写 ·

春风扑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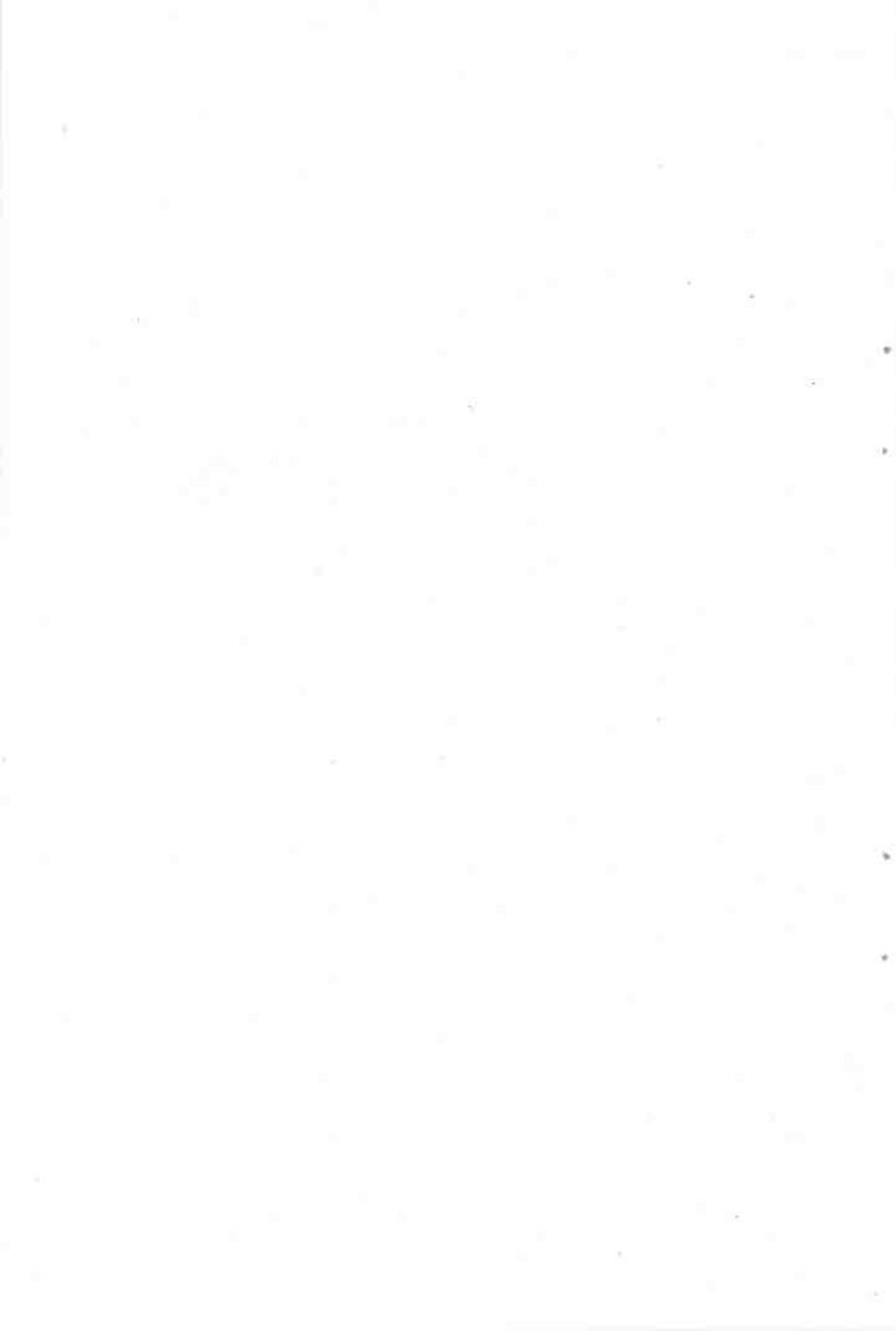
· 信 函 ·

周尧教授致作者的三封信

· 后 记 ·



• 报告文学 •



昆虫学家传奇

——记周尧教授

如果能够对于自然科学提供一点贡献，将是使用我的生命的最好道路。

——达尔文

—

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读到法布尔《昆虫的故事》，爱不释手，兴味津津。一本儿童读物竟会那么引人入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后来读《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看到年事已高的达尔文，在听到别人捕获稀有甲虫的消息时，高兴地给朋友写信说：“我的感觉好象是一匹老战马听到了号角声一样。”也不禁为之赞叹、神往！

本来么，昆虫学这个领域就够吸引人啦，想一想我们童年的时候，谁不为那勇敢好斗的蟋蟀，能飞会跳的蚱蜢叹服和喝采呢？看见闪闪发光的萤火虫和翩翩飞舞的蝴蝶，谁又能

按捺住自己盎然的情趣不去追逐和捕捉呢？而一个整年生活在昆虫世界，并把毕生精力贡献于昆虫研究的科学家，无疑是被人们热爱和受人尊敬的。他那饶有趣味的工作和富于诗意，甚至是充满了童话色彩的生活，就更叫我们一般人觉得好奇和为之着迷了。

也许正是出自于这个缘故，当昆虫学家、西北农学院周尧教授从全国科学大会获奖归来的时候，许多同志都怂恿我去访问他一下。一些熟悉他工作情况的同志，还主动热情地向我介绍起他的事迹来。说他在昆虫分类学和中国古代昆虫学史的研究方面，都是颇有成就的。由他发现 and 命名的昆虫，在四十种以上。还说这位昆虫学家，不光有一颗智慧的头脑，而且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为了采集昆虫标本他曾经六上太白，六上五台，六上华山，两上峨嵋，除过西藏和台湾，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还有一点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那别具一格的昆虫画图，神态生动，栩栩传神，是把科学性与艺术性巧妙地熔合在一起的杰作。

“周尧教授是中国昆虫学界的一个怪杰！”一位长期和周尧在一起从事昆虫研究的同志娓娓动听地向我讲起了不少关于这位昆虫学家的轶闻趣事。说他早年学习过中草药，喜欢写散文诗，还翻译过荷兰和丹麦作家的文艺作品。又说他的爱好是多方面的，如排版、印刷、照相、集邮、欣赏书法和收集美术图片。甚至他的枪法也不错，有一次，上太白山，他在一天的工作间隙就打了十六只松花鸡哩！

噢，周尧教授原来是这么个生趣横溢而又富于传奇性的人物。于是我的采访立即成行了。

二

我第一次和周尧教授见面，是在人民大厦前楼414号房间。那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省科学大会期间。当我找到房号轻轻地叩门时，很快，一位两鬓斑白、蓄着山羊胡子、五短身材的老头开门相迎了。“我就是周尧！”他用浓重的宁波口音自我介绍。他目光安祥，精力充沛，行动带有年轻人的敏捷。他一面招呼我，一面收拾桌面上的一叠稿纸。

“应约给《中国报道》写了一篇文章，”他合着水笔说，“你来得正好，刚写完。”

我瞥了一眼，只见这篇文章是用一首七言诗收尾的，那最后两句是：

白发有幸逢大治，
愿逐东风快着鞭。

于是我们的谈话便从这里开始了。

“为什么我说‘逢大治’，又说要‘快着鞭’呢？”周尧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明白我的心情啦！”

下边就是他所讲的故事：

那还是“四害”横行的时候，在陕南山村一个农家，老教授和他的一位年轻的劳动监督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有趣的争论。这位年轻的监督者是个青云直上的“角刺”人物。他走路象螳螂，吐气象甲虫，处处都摆出一幅“奴隶总管”的架势。

有一天劳动归来，老教授又拿起他刚采到的介壳虫（一

种比较原始的虫子)标本研究起来了。年轻的监督者突然用手指着老教授的鼻子,阴阳怪气地说:

“我说你们这些老家伙呀,脑子里不是名,就是利。”

老教授苦笑了一下,没有答理,但心里却暗暗叫苦说,“天哪,怎么由‘知识越多越反动’发展到越劳动改造越反动’了!”

“喂,你说说,”年轻的监督者步步紧逼地挑衅说,“象你们这些人,脑子里除了名和利,还会再有什么东西哩?”

侮辱可以损伤一个人的心灵,但同样也可以激怒一个人的心灵。

“你吗,”老教授终于被迫作答了,“你要理解我们这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吗,还早哩,还不配……”

正在床边坐着的年轻监督者不等教授把话说完就跳了起来,说,“你……你放老实一点!”

“谁老实谁不老实,贫下中农自有公论,”老教授严肃地说,“同志,不能一天老是权、权、权,要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迟早也会跌跤的。”

“老子就是不会跌跤!”年轻的监督者出言不逊了,“老子出身贫下中农……”

“你扛过长工,讨过饭没有?”老教授问道。

“没有!”年轻的监督者振振有词地说。

“那你的所谓‘阶级苦’,还是间接的喽!”

“间接的?”

“别人吃苦瓜不等于自己尝到了苦味。”

“这个……”年轻的监督者怔住了。

“还有个‘民族恨’,”老教授继续问道,“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

“你见过以前上海有个公园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没有?”

“没有!”

“你见过洋人殴打和凌辱中国的人力车夫没有?”

“没有!”

“你看见过日本的飞机在中国的土地上狂轰乱炸的情景没有?”

“当然没有!”年轻的监督者象一块爆炭似地又跳了起来，并气势汹汹地反问说，“你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老教授款款地说，“你所谓的‘阶级苦’，说了半天还是间接的，而这个‘民族恨’，我们倒是亲身经历的。说这些没有别的用意，就是要你明白我们这老一代知识分子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

对老教授的这些话，当时被“四人帮”极左思潮弄得头昏脑胀的年轻监督者当然是一个字也进不了耳朵的。但是没多久，事实就作出了严峻的回答——他因为“自作孽”，不等“四人帮”垮台就提前栽跟头了。

讲完了这个故事，周尧说，“我无意于责怪这个年轻人，因为严格地说，他也是叫‘四人帮’给毒害了。但是，可以看出一点，‘四人帮’对广大知识分子实行专政，把文化科学事业糟踏成了什么样子。说起来，真是叫人感到痛心啊!”

接着，周尧教授便向我谈起了自己的生平。他说，“我坎坷的一生，就象我多年来采集昆虫标本时踏遍的羊肠小道一样，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他的谈话时而言词慷慨，时而语

音低沉。当讲到党中央把他和广大知识分子从“四人帮”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他虽则一再控制自己激动的感情，最后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了。

三

研究昆虫几乎是周尧与生俱来的人生主题。从小打柴的时候，他就和故乡（浙江鄞县）山坡上的茕蒿和蝉花叫上劲啦！茕蒿是一种喜食豆叶的小昆虫，生性特别机灵，只要扑捉一两个，用枝条穿起来“示众”，其余的同类一望见便相率而逃。小小的周尧在挖蝉花之余，就专喜欢捉一两只茕蒿，玩“杀一儆百”的闹剧。为了贪玩这些，他常常连自己打柴的正式使命也给耽误了。有一回，父亲悄悄地跟上山来，发现了周尧的秘密——当他正猫着身子逗弄茕蒿的时候，父亲愤怒的一脚，把他踢得象一只皮球一样，咕辘辘地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尽管这样，他还是初衷难改，因此在家里博得了个“拗牛”的称号。

十四岁，这只天性外向的小“拗牛”，第一次脱缰了。他为了去革命策源地广东求学，便私自顶着狂风巨浪横渡象山港，没想到刚刚逃到象山，就被跟踪而来的父亲给抓住了。垂头丧气的周尧人被抓了回来，而那一颗远走高飞的心并没有死，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不无遗憾地写诗说：

象港风狂海涛汹，
颠簸片舟渡顽童，

阻程为因双亲泪，
梦魂何时到广东？

头脑固执的父亲，弄了许多书要他读，希望把儿子塑造成一个未来的律师。可是少年周尧心目中的英雄却是世界上两个著名的旅行家——中国的徐霞客和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还有《唐人小说》中那位气度豪爽、仗剑去国的虬髯客的形象，也不时在他的脑海里闪现。

一九三四年，周尧经过了一段“学书不成，又学剑”的过程，还是按照自己的宿愿考入江苏南通农学院，从尤其伟教授学习昆虫。当时的昆虫研究，在中国尚属草创阶段，学农的人本来就不多，学习昆虫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年轻的周尧为了普及科学，引进同好，便在老师尤其伟的支持下，主动地组织起一个“昆虫趣味会”来，并编辑出版了一本《趣味的昆虫》杂志。荣誉会长由尤其伟担任，会长和杂志主编这些实际工作的担子，自然落到了周尧稚嫩的肩膀上。

别看这个“昆虫趣味会”不怎么起眼，但它很快地团结和吸引了全国一批有志于研究昆虫的后起之秀。这批人中后来有不少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比如现任华南农学院院长、昆虫病理专家赵善欢，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蝴蝶专家李传隆以及现在中山大学任教，在生物防治方面很有成就的蒲蛰龙教授等，在早年都曾经是“昆虫趣味会”的会员。

在南通农学院，周尧一面学习，一面主办刊物，抽空还和尤其伟老师出外采集昆虫标本。一九三五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他们曾去宁波一趟。回来后，周尧便写了一篇《宁波凤蝶志》的学术文章，在《趣味的昆虫》上连载。虽然这篇

论文现在看来未免浅陋，但那种“初生乳犊不畏虎”的精神，却无不叫人惊叹和敬佩！

为了改变昆虫教材全是外国人编写的状况，热心的周尧又极力鼓动沈其伟老师把他的《虫学大纲》及早编辑出版，自己并主动地替老师搜集资料，代为绘图。终于使这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昆虫学著作破天荒地在上海问世了。

南通是周尧学习昆虫的起点，但却远不是他的终点。对于有着“鸿鹄之志”的周尧来说，他知道前边路更长、峰更险，还有更开阔的云天。

这时候，意大利的昆虫学家培莱塞（Berlese）和西尔维斯特利（F.Silvestri）正异军突起，声誉日隆，大有执国际昆虫学界的牛耳之势。各国习研昆虫的莘莘学子，一时为之倾倒，慕名而往的不绝于途。“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于是周尧的目光也自然转向罗马和拿波里了。

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二十六岁的周尧用东拼西凑弄来的钱买到一张船票，决然登上了黄浦江边的意轮“绿公爵号”。但此刻，他的心情却并不是没有矛盾的。想到自己马上要只身远航，赴欧深造，将来要在昆虫研究方面做一番事业时，虬髯客和李靖夫妇分手时所说的“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仿佛也正好是他的临别赠言。但回头了望祖国多灾多难的大地时，革命烈士秋瑾的诗句：“头脑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又跳进了他的脑际。周尧就是抱着这种矛盾重重的心情踏上了茫茫的海程。

经过了晕船呕吐的三个星期的长途颠簸之后，周尧在久已向往的马可·波罗的家乡——意大利的水上城市威尼斯登